



# 超越“自己拥有自己享用”生活方式

诸大建

## 新民时论

看到上海主管部门给网约车颁发第一个经营执照,觉得是有国际风范地搞了一次分享经济的创新试水。对此事,有许多人已经从生产端和供给端的角度进行评论,我倒觉得可以从消费端和生活端发言,呼吁我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超越“自己拥有自己享用”的传统模式。

长期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氛围中,我们的主流价值强调现代化生活的标志是“个人拥有个人使用”。其实,从网约车或“专车”是自己的车给他人用,从物权出租中获得合理收益,可以进一步想到,消费

方式按照产权拥有与为谁使用两个维度可以分出四种情况。以交通出行为例,说明四种方式的差别和意义:

(1)自己拥有自己使用。实例是自己买车自己开车。这是传统的以拥有为导向的现代化倡导的生活方式,强调什么东西需要自己有自己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方便性,但并不总是高效率的。看看我们家中的洗衣机等家电、私家车,甚至过大的住房面积,大多数时间没有用,就可以知道实际使用效率是不高的。如果全社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消费和生活,一边看到的是物质产品的大量生产,另一边看到的

就是大量物品的闲置和浪费。

(2)他人拥有有分享使用。实例是Uber这样的网约车,这是当下的分享经济强调的新消费模式和新生活方式,所谓“不求拥有,但求所用”。这种方式可以作为传统方式的补充,甚至替代传统方式,解决社会物品丰富但是需求配置在时间空间上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在物质产品规模为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盘活社会资源,满足增长的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大幅度提高社会总福利的水平。

(3)企业拥有有大众使用。实例是出租车以及公共汽车、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这种消

费方式是企业拥有物品(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营的),社会大众个人化非拥有地进行使用。坐出租、坐地铁,均是租用由企业提供的移动性服务。在人口日益增加、私人交通拥堵的大都市,用公共交通替代私人交通,一直是可持续城市化倡导的有效率的事情。

(4)集体拥有有集体使用。实例是坐单位里的班车解决出行问题。这是集体化或者合作社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属于会员制式的物品服务,即对外部人有排他性,对内部人不具有排他性,凡是同一组织内的人均可以自由使用。在当前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

到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或者社区,常常可以看到汽车分享系统这样的集体拥有集体使用方式。相对于私人拥有他人使用,这是广义的分享经济。

大家现在讲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关注比较多的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我倒觉得需要同时强调消费方式的革命。即从单一的强调私人拥有私人使用的旧生活模式,转向多样化的因地制宜的新生活模式,包括转向他人拥有有分享使用的分享经济模式,用一定规模的物品消耗满足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对个人和社会均高效的方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样做

可以尝到不少甜头。我自己买车多年,但是并不是凡出行均开车;上下班高峰时到市里开会,感到最佳方式是坐地铁;平时到外地出差去机场,选择打的或者坐网约车;到学校在嘉定的校区讲课,觉得坐学校班车是享受;至于自己开车,大多数情况是周末或者假期全家到外地自驾游。这样加起来,平均每年开车距离不超过5000公里,相当于日本人的平均水平。这样做既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满足了效用,也有效地减少了个人出行的碳排放足迹。(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 权力失灵

任大刚

### 结舌者言

去年4月,山西古交市客运办主任任某某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大爆粗口,并称“国家规定是狗屁”。不巧这段讲话被人录下,今年5月份在网上传开,任某某因此被中共古交市委处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其直接上级也受到相应处分。

任某某“国家规定是狗屁”的言论,是温家宝和李克强强前后两任总理感慨“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及“政令何以不出中南海”的最好注脚。

中枢权力在执行中走样,一直是政治运作中的难题,韩非子作为中国古代深入研究权力运转的第一专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且说宋国有个卖酒的人,他的量酒器非常平准,待客非常殷勤,酒的味道非常醇美,酒旗挂得很高,但就是卖不出去,以至于酒都变酸了。他感到很奇怪,不知原因何在,就去问富有智慧的闾长杨倩。

杨倩问道:“你养的狗是不是很凶猛?”卖酒者回答说:“是的。可这跟酒卖不出去有什么关系?”杨倩回答道:“人们怕狗啊。有的人家让小孩来打酒,你家的猛狗却扑上去要咬他,把人家吓跑了。这就是酒卖不出去的原因。”

韩非子认为,国家也有猛狗。有道之士身怀治国之术,想让大国君主明察起来,但是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乱咬,这就是君主被蒙蔽挟持,而有道之士不受重用的原因所在。

道理似乎还不是很明白,韩非子接着讲另一个故事。齐桓公问管仲:“治国最怕什么?”管仲回答道:“最怕社鼠啊。”齐桓公问道:“社鼠有什么可怕的?”管仲回答说:“大王见过做社坛的吗?他们把木头竖起来涂上颜料;老鼠咬穿木头,打洞藏身在其中,如果用烟火

熏它,怕把木头点着,用水灌它,怕颜料掉下来,这就是捉不到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左右,在外卖弄权势,敲诈勒索民众;在内紧密勾结,蒙蔽君主,刺探君主的情报,密告外面的党羽,内外勾结,群臣百官因此富贵。这样的近侍不诛杀,国法就被干扰破坏;而如果诛杀他们,君主与他们有感情,舍不得杀,杀了不得安宁。所以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国家的社鼠。”

韩非子问,大臣像猛狗一样迫害有道之士,左右近侍像社鼠一样刺探君主的机密内情,如果君主不能察觉,那么他怎能不受蒙蔽,国家怎能不衰亡?

韩非子认为,要除掉猛狗社鼠,只能依靠严明的执法者,吴起就是模范执法者。据说吴起有一次把织丝的带子拿给妻子看过后,吩咐道:“你为我织条丝带,织成这样。”

丝带织成后一比较,新织的那条非常好。吴起说:“让你织的丝带,要求像样品一样。现在你把它织得那么好,为什么?”他妻子回答说:“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额外多用了工夫而已。”吴起说道:“我并没有要求你这样。”

吴起让她穿好衣服,把她休了送回娘家。她父亲前去求情,吴起说道:“吴起家从来不说空话。”拒绝所请。

在韩非子看来,围绕中枢权力周围有各种各样利益谋划的势力,他们像猛狗社鼠一样,侵蚀着中枢权力。韩非子认为,要打击权力场的猛狗社鼠,只能靠吴起这样一丝不苟、绝情寡义,像精密仪器一样执行法律不走样的人。

但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情。世上极少有除了君主和法律,谁也不认的人。韩非子的这套法制逻辑的迷惑性,就在于幻想吴起这样的人会源源不断涌出来,而历史长河中猛狗和社鼠的绵绵不绝,反证吴起可遇而不可求。

## 金色马车以外的意义

朱绩崧

### 北窗絮语

习近平主席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各段行程看点颇多,深度报道此起彼伏。其中,“习大大”与英国女王共同乘坐的皇家金色马车以及该国娱乐版不可或缺凯特王妃,都成了网友和部分媒体关注的对象。

然而,学了十几年英文的我,却以为英国人如何奢华,怎样娱乐,这是他们的事。于崛起的中国,焦点更应投射在那些支撑起这一片繁盛景象的力量上。

这些力量,离不开政治、经济、历史、地缘、民族性格等等因素,其共同的效应则不妨用霍夫曼勋爵在本世纪初发表的一段庭审判辞来归纳:“于天下万邦之中,吾国(即英国)仰赖既定之体制、价值之传承,得以越数百年而史不绝。”也就是说,在长期的稳定中谋求发展富强,背书了英国民族自豪感。

在中国日益深化改革开放的当今世界,包容、互鉴是主旋律。我们如何“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在正确的范围、以适当的方式借鉴英国的成功经验,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与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这是摆在面前的大课题。

要攻克这项课题,首先离不开深入了解英、美、加、澳这些英语强国。按理说,中国是全学英语,英语教育在中国也是一门盈利可观的大产业。可是,我们背熟“李雷和韩梅梅”,就真的读懂了西方文化吗?最新报道告诉我们,习

主席在艰难困苦的早年岁月,曾想方设法借来莎士比亚亚名剧阅读,“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反观当下的英语教育,目标模糊,体制涣散,要么学十年都看不懂、说不出、写不来,要么就是学好了只求出国、高薪、做个财务自由的“自了汉”,哪里能做日新邦家的大文章?回想以严复为代表的那一代志在强国富民的西学领袖,通事如我,更是深感不安。

星移斗转,今天的中国凭借三十年来斐然傲世的建设成就,自然不屑“技精必强,国强必霸”的枪炮思维,而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秉持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大国复兴的气度。正如习主席在伦敦金融城演讲时指出的,中英两国“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视彼此发展为自身机遇,继续灵活务实推进双方合作,加快各自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金融、基建等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共促东西方文明对话,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促进世界文明多样化”。这番格局、境界,相比清末流行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远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人文交流”,“文明对话”对熟练掌握母语、外语,辩证理解各派思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新闻固然可以大秀特秀英国帝制的英雄美人、鲜衣怒马,但喧嚣过后,我们不能不保持冷静,正视某些领域的差距。唯有如此,才能为抓住时代机遇,拥抱“黄金时代”做好文化上最充足的准备。

## 教育的基因

姜泓冰

### 拾字街头

上个周末,上海中学度过了它成立150周年的纪念日。那一天,郁郁葱葱的上中校园里满满都是呼朋引伴的校友,从白发老人到青年才俊,比起国内许多大中小学的校庆来,衣着更精致讲究,平均颜值很高。上中校长在台上自豪地报告说,学校培养了多少位党政领导、多少院士、大学校长,但其实上中的真正意义,大概更在于,以城市名字命名的它,在经历150年历史沧桑和努力坚持之后,已是这座城市教育水平的代表、文化风习的塑造者,是海派文化精神有形符号之一。

上海自近代以来的持续发展和文化形成过程中,教育的作用有多大、戏份有多重,似乎并没有人估量过,也似乎怎么估量都不会过分。

没有上中这般可以直追到龙门书院的幸运,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办学大调整以及一次次合并、改名潮流,许多当年的名校,今天已经不见踪迹;存留至今的,多半也是校址一次次搬迁,崭新的校园和楼宇不断启用,每次面对国外知名高校经过几百年积淀的古老建筑与苍翠林木,都会有些面目全非的遗憾。

然而且慢。在高校的校园里行走愈久,愈会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基因传承,其实比什么都顽强和重要。比如当年办在上海、后来消失了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震旦学院、中西女中等等,几乎都只是“名亡而实存”。前些天,老圣约翰办世界校友会,从华东师大到交大医学院,好几所当代高校的校园里都能看到它的校友身影。

也是上周,华东师大还在为纪念前身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诞辰150周年而

出书,学校档案馆馆长汤涛老师花了数年时间精力去翻查档案,还努力想为这位年代久远的办学老校长正名。

谁是王伯群?今天的多数人都大概已不知道,一些人如我,仅知道一个传说:这位大夏大学校长为娶年轻校花,造了一座美丽的花园洋房。房子在愚园路路上,抗战时征为汪公馆,如今则是长宁区少年宫。

与美人傍大款式的八卦轶闻相伴的,当然不会是多么正面的形象。但直到这一次看了华东师大研究者第一次公开的那些书信、文稿、会议纪要等等众多档案资料,以及对当年传说事实的订正,我们才看到作为教育家的王伯群的真相,他不仅个人慷慨捐资更擅长募捐运作,既为普通学生找工作写亲笔推荐信,又彬彬有礼坚决辞退有背景的违纪生,信奉“自强不息”,砥砺办学,直至辛劳病逝在抗战内迁、艰难维持的办学路上。

原来“校花”并不曾慕恋虚名、开出金钱条件,校长也不是“近水楼台”或贪污腐败,当年他全情投入、办得风生水起,有“中国哥大”之称的大夏,也已像许多当年大学一样,在物换星移中戛然而终。

初闻真相,不免叹息。再探身历史,分明看到有更多人

与事,都曾被误读、被遮蔽,有人得以拨乱反正、重获认识,也有人,可能就此论定,但那又如何?站在华东师大中大北校区的草坪上,对着王伯群当年几乎一人之力筹款11.7万大洋建起的大夏大学群贤堂、今天的文史楼,想想今天以一派典雅气息熏陶着上海理工大学学生的老沪江大学建筑、华东政法校园里自圣约翰大学凝聚而散发的沉稳气息,揣测王校长若地下有知,也会欣慰:只要教育的财富与文化的基因在,便好。